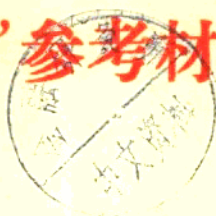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日

学习“三本书”参考材料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编印

编 者 说 明

根据中共中央〔82〕38号文件和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十二大文件的意见的要求，省委宣传部于四月一日至十六日在合肥召开了全省学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邓小平文选》和《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49——1956年）》三本政治理论书籍备课会议。会议在各地、市分头专题准备的基础上，经过讨论、修改和补充，形成了这个学习“三本书”参考材料。主要供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理论干部在组织学习、宣讲时参考。

参加本材料编写的有：宿县地委、淮北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第一讲）；淮南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巢湖地委宣传部理论科（第二讲）；六安地委、芜湖市委宣传 部理论科（第三讲）；合肥市委宣传 部理论科、宣城地委讲师团（第四讲）；马鞍山市委、安庆地委宣传 部理论科（第五讲）；蚌埠市委讲师团、安庆市委宣传 部理论研究室、阜阳地委宣传 部理论科（第六讲）；滁县县委、铜陵市委、徽州地委宣传 部理论科（第七讲）。省委宣传 部理论教育处的同志参加了本书的讨论和修改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不高，难免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 第一讲：解放思想，~~重新确立马列思~~
主义的~~思想路线~~
..... (1)
- 第二讲：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 (21)
- 第三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
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 (36)
- 第四讲：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经济
..... (55)
-

第五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74)

第六讲：加强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94)

第七讲：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
党的领导
..... (115)

第 一 讲

解放思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自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解放思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一项最重大的成果，是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首要标志。重温这段历史，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坚定信心，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十二大精神上来，从而更自觉地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学习这个专题，要着重弄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 一，解放思想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前提；
-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
- 三，端正思想路线是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关键。

一、解放思想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前提

（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所表述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我们党的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不仅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一度占了统治地位，结果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的损失，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这就使我们党在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二十二年间，能够自觉地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历史经验证明，党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解放思想？

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一个时期，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滋长了教条主义习气和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背离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以后，迫切需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五十年代后期，由于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和全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经济建设上，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政治上，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量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阶级关系，把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例如，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同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地纠正这些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更把这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推向极端，鼓吹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以致便“早请示”、晚汇报”、“忠字

舞”、“语录操”一类东西盛行一时。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领袖的威信，而且严重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使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遭到严重的破坏，严重地束缚了广大干部的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作了客观的分析。他指出：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其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其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其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使一些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这就势必造成人们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他进一步概括了当时思想僵化产生的“三种怪现象”：第一种，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第二种，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第三种，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干部中的这种精神状况，同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需要极不适应，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尖锐的矛盾。尤为严重的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阻挠全党纠正“左”的错误，使干部队伍的思想僵化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强调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系列讲话，深刻地阐明了提出解放思想的目的就在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必须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前提。

（三）“两个凡是”的实质是阻止解放思想，坚持“左”倾错误。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党急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主持撰稿并决定发表这篇社论的是汪东兴同志，但是最早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却是华国锋同志。

“两个凡是”的口号一提出，便立即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反对。他在几次重要讲话中，都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明确指出他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要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如果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不能纠正，我们党长期以来所犯的“左”倾错误也就只能继续下去。第二、“两个凡是”割裂、歪曲、损害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指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它的科学体系。如果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坚持，就会把毛泽东思想搞得支离破碎，不能根据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第三、搞“两个凡是”必然导致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而很多条件是变化的。比如现代化建设有很多条件是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所没有的，有许多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讲过，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许多问题如何解决？总之，提出“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而在政治上则是为了阻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来工作，阻止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巨大洪流，继续坚持以前的错误思想路线，维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精神枷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间，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方面呈现徘徊局面，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两个凡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真理标准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社论发表后不久，邓小平就在同年四月十日写信给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

“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在同汪东兴、李鑫的谈话中批评了“两个凡是”，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主席讲，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都改得乱七八糟呢？就是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邓小平接着说：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马恩没有说过“两个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两个凡是”，毛主席自己没有说过“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大闭幕后不久，陈云同志在九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重要文章，指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的党内外同志赞成文章的观点，很自然地把实事求是跟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联系起来讨论，用实践的结果去检验过去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去认真地进行拨乱反正。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的非难，被说成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正因为有阻力，解放思想的历史潮流在回旋激荡中反而更增加了它的冲刷力和抗冲击力，思想理论界乃至全

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更加热烈而深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这场讨论取得圆满的结果。一九七八年从六月到十一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形成了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指出：“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场讨论时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党的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

党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

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一）为什么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新党章又增加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几句话，对党的思想路线做了准确而完整的概括。其中，“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毛泽东同志赋予它新的科学含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1页）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论述，把实事求是提高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阐明了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所处的重要地位。首先，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从“实事”出发，就是承认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客观实在，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他把“是”解释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把“求”解释为研究，并且认为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是承认物质世界及其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坚持了世界可知论的观点。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阐明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其次，实事求是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因为人们要获得正

确的认识，必须对“实事”即客观事物作出正确的反映，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这种正确的认识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获得，至于求得的这个“是”是否正确，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认识和实践的反复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不断深入的过程；第三，实事求是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都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实际贯彻和具体应用，是一切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总之，实事求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丢掉了它，就失去了思想路线的灵魂。所以，我们党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讲得很多、很充分。他在一九七八年九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毛主席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到胜利，就是靠这个。同年十二月他又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页）当时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一点呢？这不仅因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完全糟蹋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仍然有人反对实事求是。按照他们的观点，只要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对于这种错误观点，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八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且联系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重要

性，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根本观点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一致性。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对于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实事求是，就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过去遗留问题成堆成山，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特别是纠正大批的冤假错案，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该要大处着眼，不可能把每个细节都弄得很清楚，这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的还是为了向前看，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了使全党把精力集中在现代化建设上来。所谓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包括各个方面的新情况，各个方面的新问题，特别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而归根到底，是要研究和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

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葬送。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今后，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都要用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的政治。

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邓小平同志说：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在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二要善于选用人才，量才授予职责。用人的政治标准就是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要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路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的成绩大、收入多而先富起来。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

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予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三) 实事求是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过程。结合还是不结合、结合得怎样,这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和马列主义水平高低的一个根本标志。正如胡耀邦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指出的:“如果根本不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在空中,当作神,那就等于打着招牌招摇撞骗,只能叫做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如果结合得不紧密,只能叫做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紧密结合。”怎样做到紧密结合?第一,一定要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站在科学的高峰,没有理论指导是绝对不行的。必须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使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全党同志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不断地学习,才能提高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